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

石培华 王屹君

文旅发展连接文化传承、产业发展、民生改善和地方形象,既是需要被看见的“注意力经济”,也是必须依靠产品、服务和运营支撑的实体产业。多重属性交织,决定了文旅发展不能简单以游客人次、投资规模、项目数量或网络热度衡量成效,更不能把一时声势等同于长远实绩。“十五五”期间,应坚持为民造福、实事求是、尊重规律,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谋划、建设、运营、治理和考核全过程,统筹处理好发展中的关键关系,推动文旅从“看上去很热”走向“长期真正有效”。

统筹处理好“面子”与“里子”的关系。文旅发展具有鲜明的注意力经济属性。目的地要吸引游客,离不开品牌传播、节庆活动、场景营造和市场推广;优质资源如果长期“养在深闺”,也难以转化为消费和发展动力。传播带来的是关注,产品和服务决定能否留下游客、形成口碑。统筹好“面子”与“里子”,既要善于讲好地方故事、塑造品牌形象,也要把功夫下在文化挖掘、产品品质、服务体验和持续运营上,以扎实的“里子”支撑外在形象,再以有效传播放大产品价值。

统筹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。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,既要敏锐捕捉消费趋势,及时推出新产品、新场景,以短期创新激活市场、积累客源,又要保持战略定力,把阶段性热度转化为产品迭代、口碑沉淀和产业链成长。短期创新为长期发展打开空间,长期积累为短期热点提供支撑。既要有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,也要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,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。

统筹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。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,关键是守住文化本真、价值导向和生态底线,同时以当代表达激活传统资源,让文化可感知、可参与、可体验。守正不是守旧,创新不是任性。只有建立在资源禀赋、文化根脉和市场需求基础上的创新,才能既有新意,又有生命力。

统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文旅综合性强,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资源保护、市场秩序和安全治理都离不开政府统筹;产品开发、业态创新、服务优化和持续运营,则需要市场主体发挥作用。让政府和市场各尽其责、协同发力,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。

统筹处理好开发与运营的关系。文旅项目的价值是在持续运营中逐步形成的,与一般建设项目相比,文旅项目更依赖内容供给、客源组织、服务品质和业态更新。若立项时只算建设投资、不问谁来运营、游客为何而来、后续如何维持,建成后就容易出现缺客流、缺内容、缺经营等问题。处理好开发与运营的关系,必须把运营思维前置,将目标客群、消费需求、运营主体、商业模式、资金平衡和风险评估纳入项目论证,推动供给从“有什么建什么”转向“市场需要什么、地方适合做什么”。对已建成项目,也应把盘活存量、更新内容、改善服务放在重要位置。

统筹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。文化遗产、传统村落和自然生态是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,其中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。保护不是发展的对立面,而是长远发展的前提,一旦为了短期客流和收益破坏资源本体,损失往往难以弥补。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,通过展示阐释、文化体验、数字化传播和适度旅游活动,让资源融入当代生活;同时依据资源类型、承载能力和保护要求确定开发强度,避免过度商业化和景观化改造。既要守住保护底线,也要提升活化利用水平,让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相互促进。

统筹处理好事业与产业的关系。文旅既是产业,也是事业。处理好事业与产业的关系,不是简单折中,而是让两者相互支撑——以产业发展增强文化服务和资源保护的可持续能力,以事业属性校准产业发展的价值方向。文旅发展既要算经济账,也要算文化账、民生账和长远账,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,让产业成长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

统筹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。文旅新业态和新场景不断拓展,也对设施维护、气象预警、交通组织、消防救援和应急处置提出更高要求。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,关键在于把风险识别、承载量管理、标准规范、日常巡查和应急准备嵌入规划、建设和运营全过程,按业态特点实施分类治理。既不能为了追求增长而突破安全底线,也不能把安全简单等同于禁止、停摆,以“一刀切”消解合理需求。用专业治理守住底线,才能为创新发展留出空间。

统筹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。文旅建设最终服务于人。道路、场馆、游客中心、停车场和智慧设施是必要基础,但硬件完善不等于体验优良。游客能否方便抵达、清晰导览、安心消费、舒适休憩,居民能否分享发展机会、维持日常生活秩序,往往取决于服务细节和文化内容。若只重地标、景观和建筑,不重讲解、卫生、交通、价格、无障碍服务和人文关怀,就会出现“有设施、少体验”“有空间、缺内容”的现象。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,要以人的实际需求配置资源,既补齐硬件短板,也提升服务和内容供给;既关注游客满意度,也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感受。

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。文旅发展必须立足一地资源、市场、区位、产业基础和财政能力。既要把本地特色做深做透,又要把文旅放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中谋划,推动其与农业、工业、商贸、体育、康养、城乡建设等协同发展,还要加强区域合作、线路联通和品牌协同,避免各自为战、同质竞争。因地制宜、错位发展,才能以一域之特色服务全局之发展。

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决策、运营和考核全过程。正确政绩观不仅要体现在思想认识上,更要落实到制度安排和工作方法中。要把调查研究、市场分析、专业论证和风险评估作为重大文旅项目决策的前置环节,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,持续跟踪项目建设、运营、资产效益和社会影响。健全文旅干部专业培训机制,优化考核评价机制,把游客满意度、居民获得感、文化保护成效、运营质量、就业带动和财政可持续性纳入综合评价。对符合实际、敢于创新的探索,应完善容错纠错机制;对盲目举债、重建轻营、弄虚作假和破坏资源的行为,则要严肃纠偏。

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。衡量文旅发展的成色,归根到底要看人民群众是否受益、文化资源是否得到保护传承、产业是否形成持续发展能力、地方发展是否更加协调。只有把为民造福落实到每一次决策、每一个项目、每一处服务中,坚持从实际出发、按规律办事,以实干求实效,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文旅实绩,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。

(石培华系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;王屹君系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)

碑林里的“文治”与“物化”

朱红梅

作为国内规模宏大的碑石典藏集群,西安碑林汇聚汉唐以降的经典碑版,是古代官方典章、经学文本与书迹遗存的汇集之地。西安碑林所藏的碑刻不仅具有书法与文物的独特价值,其文字当初被刻制、被安置、被观看的方式,也承载着一套系统性的治理逻辑。这套治理逻辑包含两条路径:“文治”与“物化”。“文治”确立书写秩序,“物化”生产空间秩序,二者共同塑造了文字所承载的秩序与信仰。

石经与“文治”:书写秩序的确立

“文治”理想欲从观念转化为现实,必须依托一套可精确复制的符号系统。

自汉末至清中叶,中国共有七个朝代刊刻儒家石经,比如东汉的《熹平石经》用隶书,曹魏的《正始石经》古文、篆文、隶书三体并列,唐代的《开成石经》用楷书。虽字体不同,用意却一致:都是国家通过刊刻石经确立经典书写的统一标准。

《开成石经》是唐代正字运动的集大成之作。《五经文字》《九经字样》等著作附刻于石经之后,系统总结正字标准与用字规律。吴丽君在考察《开成石经》刊刻的社会背景时指出,其刊刻完成“使经籍用字混乱状况得到了控制”。这就揭示了一个今天需要重新被审视的事实:汉字的整合功能,首先通过“规范”而非“审美”实现。石经立于国子监,首要功能是供人核对。读书人写字拿不准时,以石经为准。这种“标准答案”式的功能,使石经成为刻在石头上的书写法规。

石经并非孤立存在。国子监在刊刻石经的同时,也通过官学教育和经籍传抄,将统一的书写规范推向全国各地。各级官吏在公文往来中遵循这一规范,久而久之,一种共同的文字秩序便得以形成。“文治”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,落实为日常行政中的书写实践。

碑刻与“物化”:空间秩序的生产

碑林中的汉字并非全部服务于“规范”。唐代的纪功碑、景教碑、墓志铭,功能迥异:墓志埋入地下,纪功碑立于特定空间节点,景教碑安置于寺院之中。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让人“照着写”,而是为了让人“看见”。

“物化”指的是将文字所负载的观念与叙事,通过铭刻工艺嵌入特定物质载体与空间位置,使文字获得超越文本本身的力量。一块立在陵墓前的碑,它标记空间,宣告存在,塑造了一种由文字定义的视觉秩序。碑林通过石刻分类实现知识的组织与传播,其空间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生产,将抽象的皇权与天命观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景观。

“文治”与“物化”这两条路径,根植于汉字兼具强表意性与高可塑性的结构特性,使其能同时胜任两项任务:文书行政要求逻辑承载力与书写流变性,空间象征要求视觉表现力与形式规范性。由此可见,早期的文明建构,不仅依靠思想教化与法律条文,同样依赖将核心价值观可视化、物质化于日常空间。汉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通用技术媒介的角色。

从“被观看”到“被使用”:碑林文字生命力的当代承续

碑林文字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发挥作用,根本前提在于它们始终处于某种“使用关系”之中:石经供读书人核对,纪功碑供行人辨认空间秩序,墓志供后代确认身份谱系。每一类碑刻都嵌入特定的社会环节,承担不可替代的功能。文字不是被“观看”的,而是被“使用”的。“文治”与“物化”的效力,正来自这种使用关系所提供的制度约束力与空间在场感,使得附着于金石的文字秩序持续向社会生活渗透。

自碑林成为博物馆对外开放之后,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换:从“可使用的文字”变为“被观看的文物”。这一转换有其历史必然性,但其代价也是真实的。当碑刻只剩下“被观看”的功能,它就不再是“文治”的载体或“物化”的标识,而只是一件静态的书法作品。为了突破这一困境,西安碑林博物馆近年来推进数字化与公众教育活动,重建文字的可检索性与可参与性。目前,该馆已完成633件一、二级文物的三维数字化扫描,并正在推进碑林字库建设,计划收录约85万字。其推出的刻碑互动体验,模拟的不是“观看碑刻”的过程,而是“生产碑刻”的过程。参与者进入的是一个文字被使用的场景,而非仅仅面对一件被观看的展品。

这一实践的启示不在于技术本身,而在于它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数字时代的“文字使用者”正在从“书写者”变为“调用者”与“再生产者”。传统社会中,人们与碑林文字的关系是“照着写”;在数字环境下,这种关系变为“检索它”“调用它”“用它生成新的内容”。参与这一进程的主体,也扩展至学者、博物馆工作者、数字游民乃至每一位普通民众。他们在使用碑林文字的同时,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。碑林文字由此从“被观看”重新回到“被使用”,其塑造秩序与信仰的功能,也就在新的使用关系中获得了承续。

结语

碑林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携带着双重信息:它刻着什么字,以及它为什么被刻在那里。前者是“文治”的遗产,后者是“物化”的遗产。而这两条路径的共同前提,是汉字始终处于“被使用”的状态。当碑刻从原境移入展厅,从“使用”变为“观看”,它所承载的治理逻辑也随之隐匿。当代数字化实践的意义,不在于让碑刻“更好看”,而在于让碑林文字重新“可用”。当国家、学者与公众共同参与到碑林文字的承续之中时,文字所承载的秩序与信仰便不再只是历史的遗存,而至今仍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这份源自汉唐的治理智慧,对于理解当代文化遗产“活化”的深层逻辑,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。

(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副教授)

白鹭洲书院草木承载的庐陵文脉与当代活化路径

赖路明 刘黎霞

白鹭洲书院位列江西三大书院,坐落在吉安赣江江心洲之上,千百年间其培育无数庐陵英才,沉淀了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。书院内经认定的古树名木,是承载庐陵文脉的“活文物”;而整片洲岛草木群落共同构成书院不可分割的生态环境。一草一木根植于赣中大地,串联起地域历史、君子精神与传统育人思想,蕴藏着独属于庐陵的文化密码。立足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传承发展需求,深挖书院草木背后的历史内涵,探索保护、研究、传播、利用一体化活化模式,能够推动书院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文化遗存持续释放育人、文旅、生态多重价值。

书院草木承载深厚历史文化内涵

白鹭洲书院各类花木依照文化寓意可分为三类,分别对应地域文明标识、君子精神象征、传统教育理念,层层勾勒出书院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。

第一类是以樟树、桑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活态印记,标记江西本土文明发展脉络。樟树是书院内数量最多、树龄最久的树种,风月楼前树龄500余年的古樟,见证了书院数百年的兴衰起落。江西古称“豫章”,本意即为大樟树,吉安民间自古流传“无樟不成村”,樟树早已融入本地百姓生活,成为承载本土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。延生堂前百年古桑承载着多元文明交融记忆:桑树是古代丝绸生产的核心作物,见证江南与西域商贸与文化往来;桑叶是吉州窑木叶天目盏的制作原料,串联起宋代吉州窑繁盛的陶瓷技艺,暗含茶禅相融的东方美学。古人以“桑梓”代指故乡,历代文人也留下诸多咏桑诗作:清代书院山长孔兴浙笔下的桑林掩映江景,意境悠然;王世业借“沧桑”一词,以桑树见证岁月动荡,反衬书院文脉历经战火依旧绵延不绝。

第二类以松柏、翠竹、兰花为代表,承载传统文人崇尚的君子品格,构成书院修身立德的精神内核。云章阁旁的明代古柏苍劲挺拔,西侧成片的松林形成“万松环翠”景观。松柏不畏霜雪,象征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。碑廊四周成片翠竹四季常青,竹身中空代表谦逊,节节挺拔寓意正直。南宋、元代诗人留下多篇写竹的诗篇,竹影临水、炊烟伴竹的画面,勾勒出书院清净治学的诗意环境。云章阁栽植的兰花,香气淡雅、品性高洁,是古代文人心中高雅志趣的象征。清代施闰章咏兰,以兰花秋冬凋零、春日复生的特质比喻书院文脉生生不息;刘绎则以兰代指知己同窗,赋予兰花人文交往的温情内涵。

第三类以桃李、桂树、芭蕉为代表,将古代书院育人理念具象化,每一种植物都暗含劝学育人的深意。书院四周桃李成林,对应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的教育理想。历代诗文常以桃李喻门下英才,赞颂书院以才兴学、为国储才的办学追求。院内金桂、银桂每至金秋香气满庭,“蟾宫折桂”的美好寓意,寄托着师者对学子勤学精进、学有所成的期盼,把花香与读书求仕的理想紧密结合。碑廊间的芭蕉则承载惜时修心的治学提醒,雨打芭蕉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意象,相关诗作多描绘灯下读书、蕉叶映窗的书院场景,既营造浓郁书香氛围,也劝诫学子珍惜光阴、静心治学。

书院草木在当下拥有多重现实价值

当下,白鹭洲书院内各类花木早已不只是供游人观赏的园林景致,更是助力生态建设、厚植文化自信、开展青少年德育实践的宝贵素材。

从生态层面来看,院内草木留存着古人顺应自然的营造巧思,可为当下生态保护工作提供参考。古时营建书院,林木一方面起到阻隔江水、平衡洲岛微气候的防护作用,另一方面又借草木意象承载人文内涵,让生态管护与文脉传承同步落地。梳理其中天人合一的营造思路,能够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;依托特色植物景观打造特色文旅线路,也能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地方文旅发展动能。

从文化层面来讲,各类花木是拉近大众与本土文脉距离的良好媒介。樟树承载豫章千年历史、桑树牵出吉州窑非遗技艺,能持续深化江西群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;松柏、翠竹、兰花所象征的坚守、刚正、清雅品格,与爱国、诚信、友善等价值观内在相通……系统梳理花木背后的人文典故,也能向外展现我国古代书院园林与教育相融共生的独特文化风貌。

从育人层面而言,书院草木是可触摸、可感知的实景德育素材。依托松柏、竹、兰所承载的精神寓意,能够引导青少年涵养品德、修身正心;桑梓寄怀故土、桃李喻指英才,有利于厚植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。向青少年同步讲解古树生长特点与生态功能,还能在润物无声中普及生态知识,实现自然科普与品德教化的一体推进。

多措并举推动书院草木文脉长效活化

要充分释放书院草木的文化、教育、经济价值,需要构建科学保护、深度研究、创新传播、合理利用四位一体的完整活化路径。首先,做好常态化科学保护,摸排登记院内全部植被,为古樟、古桑等古树建立档案并持续养护。其次,参照古籍记载,遵循修旧如旧原则,补植历史上失传的花木品类,复原书院原生植物景观,匹配古建筑整体风貌。再次,组织多学科专家开展联合研究,搜集花木相关诗词与名人典故,梳理植物意象、文学文本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关联脉络,萃取凝练庐陵文化精神内核。最后,丰富传播方式,创新传播载体,在园区沿线增设解说标识,线下开展研学实践、诗词雅集活动,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科普,拓宽文化传播范围。可盘活文旅资源,融合江景、古建与草木打造特色游览路线,面向各类群体开设研学,依托草木典故打造IP与文创产品,推动书院草木承载的传统文化意蕴融入当代生活。

白鹭洲书院的花木见证了豫章地域变迁、承载书院育人理念,构筑了物我相融的文化生态。构建“保护、研究、传播、利用”活化体系,既是赓续书院千年文脉的内在要求,也是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生动实践,让书院草木承载的文脉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。

(作者单位:吉安市博物馆)

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中国打击乐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研究

马 丽

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,打击乐是一个典型的伞状学科,其内部结构繁复、分支比较独立,与钢琴、弦乐、管乐、声乐等这类“一个演奏者专注于一件乐器或技术”的学科有着本质区别。打击乐学科的核心并非某件乐器,而是一种操作逻辑——通过击打实现发声。在这种逻辑下,有完全不同的技术子领域,每个子领域都能成为一个独立专业。打击乐手要成为全能演奏者,其乐器库中有数百种发声原理、演奏方式、音色各异的乐器。

中国打击乐学科以中国民族民间打击乐理论及表演为研究对象,自20世纪60年代起,李民雄、李真贵于上海音乐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中国打击乐课程;进入21世纪,王建华、王以东、罗天琪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,构建起集理论研究和创作表演于一体的学科格局。当下,中国打击乐处于快速发展期,积极探寻契合当代打击乐发展的道路,助力教育强国建设,是每位教师的责任和使命。中国打击乐实践教学不能生搬硬套外来教学模式,在符合教学目标的前提下,应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,设计适配新时代音乐人才需求的培养路径。

成果导向教育视域下打击乐“三位一体”教学的价值阐释

成果导向教育(Outcome-Based Education)是一种以学生预期学习成果为核心、反向设计、正向实施、持续改进的先进教育理念,也是艺术类高等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范式。“以终为始、学生中心、成果可测、持续改进”是成果导向教育的核心要义。本研究将三位一体定义为:目标体系、实施体系、评价体系三位一体,推动实践教学质量提升。着重解决当前中国打击乐实践教学中“重技巧轻综合、重过程轻成果、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”的实际问题,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当代文化产业、艺术教育、民族音乐传承等多个领域的岗位需求。

成果导向教育视域下打击乐“三位一体”教学的建构路径

落实到中国打击乐专业教学方面,要紧密围绕民族音乐传承、艺术实践、职业发展这三个维度,把抽象的理念转变为可实现、可观测、可评价的教学目标。

(一)成果锚定与需求调研。对行业岗位需求予以拆解,深度调研专业乐团、艺术教育机构、社会专职单位、网络个体发展对中国打击乐人才的核心能力要求。打击乐学科毕业生要能胜任当代社会的多岗位职业需求,实现技术过硬、文化通悟、实践能落地、创新可发展的教学目标。以地域民族音乐文化、中国打击乐专业特色为基础,培育具有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传承能力的高素质民族音乐专门人才。可根据调研成果,明确毕业生需要达成的高阶能力,涵盖知识掌握、能力达成、素养体现三个维度,形成可量化、分层次的指标模式,最终提炼出演奏、教学、创编、实践这四大类关键指标。

(二)优化教学内容。根据提炼的四大关键指标来细化教学内容。演奏:扩大曲目结构,除传统作品外,把键盘、鼓类、电子、人声、剧场、多媒体、即兴等诸项纳入学习范围,将多元音乐元素与中国传统打击乐相结合,依学生个体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,使学生在演奏方面尽可能无短板。教学:要求学生以周为单位归纳学习要点,写出学习目标、难点及应对办法,通过定量总结,建立个人学习教案。每学期至少完成一次教学试讲(可用个人教案或为他人设计),同时拍摄并制作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。整体的教学思路、流程乃至互动效果由教学评价量表计入平时分。创编:每学期引导至少一组学生做小型打击乐合奏编排,就编排质量、演奏状态、文化含量而言,要求作品完成度为良好以上。研究生阶段应完成一首打击乐改编或原创曲目,其完成度应兼顾创意、技巧、文化内容,不论独奏还是重奏、合奏都可,鼓励使用本地文化素材进行创作。实践:每年举办一至两场校级或更高规格的专业演出,作品涵盖中国打击乐的不同组合、不同类别。技术上要对乐器、选槌、演奏方法等深入研究,体现专业实力;舞台上要对舞台视觉效果、艺术感染力等仔细揣摩,使音乐表演能真正吸引当代观众;创新上则要求学生发散思维,在作品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做文章。同时要求学生参与音乐会筹备的各个环节,从计划到宣传到落地,让学生全方位参与演出实践。

(三)创新教学模式。长期沿袭的精英化“一对一”教学模式,强调专项技能的精进,容易导致学生学术视野受限。而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与线上演出的发展,使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方式被重新塑造。教学中可合理并巧妙运用数智设备,如录音录像设备、节拍器软件、音乐分析软件、音乐制作软件等,制定个性化教案,建立学生对音乐科技、艺术传播、跨界融合等能力的训练,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现代市场环境,在迭代迅速的演艺市场中把握主动。同时,在课堂流程中设计翻转课堂模式,按照能力模块设置教学场景,包含教学试讲、重奏曲目编排、作品情感演绎、音乐会预演等多样化的教学情境。

(四)重构评价体系,强调过程性评价。评价可分为三个维度:日常学习表现、综合能力提升、创新能力发展,包含预习任务完成度、课堂研讨参与度、自主学习能力等。为进一步提高评价的全面性与客观性,可将学生自评、同学互评加入平时成绩计算。评价方式可结合技术指标、练习时长等定量数据以及艺术表现力、文化解读能力、实践综合能力等进行定性分析。

结语

中国打击乐学科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与研究。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从顶层设计层面,为培育契合当代传播生态、适应行业发展的高素质音乐人才提供思路。未来,还要不断深化教学创新、紧跟时代发展趋势,为音乐行业持续注入新的活力。

(作者单位: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)